

勤俭持家的经验

工人出版社



勤儉持家的經驗

*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四牌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數:20,000字 印張:1 2/16 印數:1—4,500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号: T3007·281

定價: 0.11元

目 录

“一年早安排”	2
家庭会议	5
家里的好主妇，生产中的能手	7
全家老少动手搞副业	10
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好	14
收入多也要勤俭	17
一对勤俭持家的青年夫妻	22
我和她是怎样勤俭持家的	24
一年节煤四千五百斤	27
新的生活态度	31

“一年早安排”

在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中，家庭是不是可以也来个大跃进呢？武汉市著名的“五好”家庭李春培全家訂出了“一年早安排”的1958年的大跃进规划，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春培全家规划的总精神是：深入贯彻勤儉建国、勤儉持家的方針，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勤劳、节儉、和睦、愉快。要求做到“四爱”——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三有”——有计划、有节余、有文化；“六无”——无蝇、无蚊、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并且要求在1957年节约的基础上，全年节约粮食六十斤，煤一百五十斤，猪肉四十斤，棉布四十五尺，每月收入以五十元存活期存款，随用随取，全年存有奖儲蓄四十八元，購公債四十五元。还规定每月开家庭会议一次，进行表扬批評，共同帮助，监督实现规划。李春培家中除三岁小女孩外，每人都有具体规划。李春培本人除了在家里繼續贯彻勤劳节约、在外面搞好社会活动外，还要把多快好省方針贯彻在家务上，挤出更多时间学好文化，爭取1958年达到高小畢業程度；并且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爭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李春培的爱人張振鐸是人民銀行礐口区办事处主任，每月收入一百一十七元，要养活一家十口。在1956年調整工資以前，張振鐸每月收入七十三元，除他个人費用和寄河南家用外，家中每人每月平均只六元，由于李春培勤劳节俭，日子仍然过得很好，从不欠債。1956年增加工資后，生活有了改善，全家仍然坚持勤劳节约，毫不松懈。

李春培是一位勤奋的家庭主妇，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便响应市妇联的“五好”号召，省吃俭用，支援抗美援朝。由那时候起她精打细算，过日子訂计划，几年来如一日。每天清早，她一早就来到了菜市場上，新鮮的大白菜，肥大的洋芋，营养丰富的豆腐，憑了她丰富的經驗和节约習慣很快就选定了。菜籃里装得滿滿的，有五、六斤，一共只花了三角几分錢，沒有超过“五好”计划的小菜指标，每天四角錢。在回家的路上，她想起今天能为爱人和小孩准备丰盛的菜飯，全家的日子安排得妥妥貼貼，內心里發出了笑声。

看来小孩子吃飯落几顆飯粒，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李春培却不是这样看。她認為一来要培养孩子們艰苦朴素的品质，二来大小六个孩子，如果都浪费粮食，日久天長，这笔浪费也不在少数。为了教育孩子，李春培經常給孩子們講一粥一飯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同时自己吃飯也注意不掉飯粒，从此，孩子們吃飯就小心多了。

提起添制新衣服，李春培家里有一段朴素过日子的故事。六月間清理箱子，李春培發現大孩子的棉衣太小不能再穿，需要做一套新的。由这时候起，“五好”计划里添了一

个新项目——作一套新棉衣。

七月至九月，每月都有节余，余下的钱就是买衣料的。但是，李春培的爱人对她说：“你做街道工作开会要准时，孩子们要上学，也不能迟到，买一个小闹钟好不好？”李春培再三考虑后，不同意这个意见。她说：“一个闹钟要十多块钱，有了它，早晚是方便，但是孩子冬天却不能挨冻。何况这多年来没有闹钟也按时上学和开会了！”经她这样一说，便决定不买闹钟，去买棉衣。

衣服料子她买了结实耐用的粗布，里子布家里有旧的不用再买，棉花呢，为了保暖也是买了新的。至于如何做这套衣服，李家又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到合作社去做，理由是学生要穿学生服，合作社做的又好又快；有人说“我们还是节约一点，自己家里做。”李春培同意后一个主张，决定自己动手做。为了做成学生服的样子，李春培特地找别人去学习，每天起早睡晚抽出街道工作的空余时间，一针一线地把棉衣做成功了。大孩子穿在身上，松软合体，样子满好看，非常满意。

一套新棉衣带来了一连串的新安排，大孩子的棉袄改改洗洗给二弟。二弟的上衣捐寒衣了，棉裤改了之后给老三。老三穿上八成新的裤子，心里也很喜欢。

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要妥善地安排好家庭生活，李春培也有苦恼的时候。有一次，大孩子上学要买书；二孩子没有笔也不成；女儿爱漂亮，看到同学穿花毛线衣，她也哭着伏在妈妈身上要毛线衣；老六呢，脚上穿的鞋子破了一个

洞。这该怎么办呢？李春培沒有被这些“麻煩”事吓倒，一切本着節約的精神，分別緩急来办事，書和笔要买，鞋子也要做，但是女兒的毛織衣，就耐心地給她講清道理，却要等以后再說。

在勤儉持家的家庭里，日子是快活的。李春培家充滿着民主、和睦、团結、友爱的气氛，使人感到心情舒暢。星期天，孩子們休息，愛人也由机关里回来，劳动一周之后要愉快地度过这个假日。中山公园的草坪上出現了李春培一家，有的賞花，有的散步，有的追逐着玩，快快乐乐地过了半天。李春培想：“我們小家庭的日子安排得好，国家的建設不是进展得更快嗎？”

李春培过去搞“五好”有些零敲碎打，現在作了“一年早安排”，把政治、經濟、文化、衛生、社会活动等都包括进去了，而且各人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可以相互帮助督促。李春培認為她家中从大人到小孩几年来都养成了勤劳节儉的習慣，并且已建立了正常的民主生活，这个规划是可以爭取實現的。

（根据長江日报整理）

家 庭 会 議

張 广 祿

前几年，我們家人口并不多，只有父亲、母亲、愛人、一

个孩子和我五口人。那时候，我的工資也不比現在少多少，可是經常弄得紧吃紧穿的，家庭不和睦，吵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仔細了解了一下，原来是我将每月工資拿回来交給父亲支配，由于老年人过于疼爱孙子，我的工資除了維持家庭生活外，其余都給小孩买零嘴吃了。零錢花得多了，每年一到換季时就接不上。我爱人两冬沒有添衣服了，她虽然沒有大吵大鬧，却常抱委屈；母亲也常埋怨父亲錢花得不对数，老俩口常为这事吵嘴；日子長了我爱人也插嘴了。

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常常劝家里人，可是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劝皮劝不了心，仍沒有解决問題。后来，我們的党支部書記帮我出了个主意，他說：老張啊，你是个团支部書記，领导青年工作、学习、生活很有办法，怎么就搞不好自己的家庭呢？开个家庭小会交换一下意見吧，讓大家把意見都吐出来就好办了。听了党支書这个建議，起初我还有顧慮，心想我父母都是老年人，爱人又是个家庭妇女，他們能接受这个方式嗎？又一想不能接受也沒有什么損失，反正只有好处，沒有坏处，試試看吧。于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們家就开了个家庭小会，我父亲在会上說我母亲罵小孩时有罵他的口气；說我爱人不应当当老人的面打孩子等等。我母亲和我爱人也都說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話。会开得很好。睡覺时我爱人对我說：“今天要不开这个小会，用不上三天又得打一次罗圈架（全家互相牽連吵架）。”我一看大家都說很好，以后就坚持了开家庭會議这个制度。

这样一来，大吵大鬧沒有了，一年中最多也不过頂一两

次嘴，也都是小来小去的，过去就好了。家庭和睦了，我們家庭会的内容也随着改成研究怎样改善家庭生活了。我們全家算了一次細賬，按我的工資如果每月不买菜吃就可以添一两件衣裳。于是我父亲就提出由他在铁道边刨点地种菜，省下买菜錢給大家添制衣服。我母亲也說：“我也不能吃閑飯，我帮着看孩子，替出孩子媽搞副业。”現在，我們家已經有三年不花錢买菜吃了，我爱人也經常把她搞副业掙的錢給婆婆买点东西。全家人互相体貼，互相关怀，日子过得挺愉快，我也就能專心搞生产，1957年当上了段的先进生产者。过去我們家每年都要工会补助，1957年我的两个孩子生病住院花了八十多元，也沒請工会补助。不但这样，我們还买了二十元的公債。最近，我們又开了一次家庭会，决定在1958年每月儲蓄四元，春天还要买一头小猪养着。

家里的好主妇，生产中的能手

义 珍

“她生产积极，过日子也勤儉，是个好女工！”

天津公私合营中建罗絲釘制造厂的党支部書記听說我要去訪問包装車間的女工王淑明，就这样地告訴我。

一个假日，我找到了她的家。她是一个矮小精悍的中年妇女，1956年市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屋里爐火通紅，暖洋

洋的。她的丈夫因为血压高，躺在床上养病。她向我介绍说，他已经休养快三年了。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王淑明说：十四岁她就进纱厂做工，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就被工厂辞掉了。孩子一多，生活便越来越困难。解放以后她才又到工厂作工。生活本来可以过得美满，不料丈夫又得了病，而且一病三年，全家九口人的生活负担就落到她一个人的肩上了。国家对他們很照顾，她的丈夫虽然卧病在家，但每月还能领到救济费和一些补贴。这样，每月全家仍然有七十多块钱的收入。

“一个月七十多块钱，要维持九口人的生活是不宽裕的。”王淑明接着说，“可是，花这笔钱的时候，我总想着：要用这不多的钱，把生活搞好，把儿女抚养成人，争取全家都能为这个好社会来劳动！”

她的五个大女儿，有的上中学，有的上小学。有些邻居曾建议她让大女儿呆在家里干活，免得她又忙生产，又忙家务，过分劳累。但是王淑明想：孩子学习很要紧，不能误了；再说，照料家务也是作妈妈的责任。因此她尽量自己操持家务，让孩子们安心念书。每天她照例起得很早，把炉火生起来，屋子拾掇干净，有时候还洗一盆衣裳，才去上班。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她总是先把病人、孩子隔日的饭菜做出来，第二天热一热就能吃，然后缝补浆洗，把家务料理好。晚上，她就学文化，跟女儿们在一起写字，做算术习题。她丈夫瞧她一天到晚忙个不歇，劝她对家事少操些心，但是，王淑明不愿意。她说：“家里要乱糟糟的，我在厂里就会一心

挂两头，生产也不安心了！”

操持家务，最难的是如何把钱花得好。接着，王淑明就把他们家里的开支算了一算。吃饭的开销最大，而王淑明却善于料理吃，吃得既不坏又很省钱。夏秋瓜菜便宜，王淑明就做些大菜馅儿的饽饽，瓜泥合小米面的烙饼，胡萝卜窝窝头，节省粮食；用省下的钱腌了大缸、小罐的咸菜酱菜储藏起来，留到数九寒天吃。有时候也称半斤肉，或者买三两个鸡子儿，给孩子、病人包茄干馅、萝卜干馅的饺子。这种饺子，既好吃花钱又少。家里烧的煤球，王淑明经常是自己用煤末子团，不买现成的，这样煤火费用也就便宜一些……王淑明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九口人一月的伙食费总没有超过五十元。

“居家过日子一丝一缕也要爱惜。”王淑明指着她丈夫拆理的破袜甬对我说，“像这样破得没法补的袜子，扔了也就完了，可是费点工，拆出纱来，那就可以合成线，给孩子缝缝补补也就用上了。”说到穿的，我注意看了一看，大姑娘穿了一件红花布新棉袄，两个小姑娘是旧袄上套着新褂子，其余的几个孩子穿的是旧衣服，却挺干净、整齐。王淑明说：“孩子这么多，每年每季都要添新衣是不可能的，所以按月抽存一点钱，加上得的一些奖金，分批添制。”女孩子都比较爱漂亮，像1957年过春节，大姑娘用她得的奖金做了件新衣，小妹妹有些眼红，怎么办呢？她除了给孩子们讲讲勤俭、朴素的好处以外，还把她们穿的旧衣裳染了一道色，虽然比不上新的，可是也够漂亮。他们一个月除去各项开支，有时

还能节余一两塊錢。王淑明說：“一年到头总得存个十塊八塊的，留下买公債。”

操持家务虽然很費心思，但是王淑明却没有为家务事耽誤过生产。有一次，她的小女孩出疹子、發燒，夜夜哭鬧到天亮，而在这时候丈夫的血压又高了。为了照顧好病人，她通宵达旦地抱着孩子，早晨还要赶去上班，实在累得不行，想請假歇班；而一想到生产要紧，完成国家計劃要紧，她就孩子托給工厂門口的一个老大娘照看，自己还是安下心来坚持去上班。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她也一直坚持生产，不到临盆不休息。王淑明从1953年到罗絲釘厂做包装工起，月月都超額完成生产計劃。1956年厂里罗絲釘的产量提高了好几倍，包装赶不上去，王淑明还鑽研改进了包装的操作方法，使包装工人的生产普遍提高了40—50%。

最后，王淑明高兴地說：1956年厂里調整了工資，她的工資也增加了，大女兒最近又参加了保育工作，生活将会过得更好。所以在年前她就讓丈夫請求別讓国家再給补助。王淑明說：“我們不能多花国家的錢。我們要勤儉过日子，積極搞生产，多为国家，多为将来，多为孩子们着想！”

全家老少动手搞副业

关淑賢

我五十一岁了。我丈夫比我大八岁，在通化車輛段鉄

路醫院做清掃工作。工資改革前，他每月掙三十八元，工資改革後，工資增長到四十九元五角。家中大小六口，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用，以前是六元三角，現在是八元二角多。

由於家庭人口多，收入比較少，生活是有困難的。當生活發生困難的時候，也曾想到向工會申請補助；但是又一想，國家正在建設，處處要用錢，不能依賴國家，增加國家的負擔。再說孩子大了，可以搞些副業生產，靠自己的力量能解決自己的生活困難。為了從根本上改善我家的生活，經過多次商量，就決定全家老少一齊動手，從多方面來進行副業生產。

開墾荒地種菜。在我們局子附近，有個很陡的山。山上長滿荒草和樹根子，到處都是石塊，我們取得了組織上的同意，把它一鎬一鎬地開了出來。每天早晨和傍晚，我和孩子一齊上山，揀石頭刨樹根，開出了三小塊地；我們又在煤場和鐵道兩旁，清除了垃圾和石塊，又墾出了三小塊平地，一共有三畝多。在山上，種上包米、豆子；在山下，種上豆角、土豆、白菜、大蔥等。為了讓這些莊稼蔬菜長得好，每天我和孩子都到廁所附近和大道上去揀糞，利用孩子放學後和星期天休息的時間，連同家中養豬的豬糞、人糞，抬着往地里送。野草長得快，我們便割了一遍又一遍，把割下來的草曬干了埋在地里又作肥料。這些活，我丈夫在休班的時候也幫着做。由於我們侍弄得勤，地里沒有野草，水和肥料又足，莊稼蔬菜長得很是愛人。秋後結的包米棒子比平常的要大一倍，白菜每棵有七八斤重，每棵土豆秧子能結四五

个大土豆，年年是丰收。仅1956年一年，就收获土豆一千斤，白菜三千多斤，包米八百五十斤，豆子一百二十斤……全家六口，不但全年不用买菜，还卖得了六十五元。在1955年，我們有四个月沒有买粮，給国家节约了六百六十斤粮食。

养猪。我們家每年經常喂两口猪。猪食，除了买医院的泔水，其余都是用自己家里的刷鍋水、淘米水和向邻居要来的泔水。夏天，孩子們到山上、野地去采些野菜；秋后，用自己种的土豆秧子、白菜帮子、豆角叶子，有时候还到附近菜园子去揀些帮子、叶子回来，切碎了煮一煮給猪吃。猪很爱吃这些东西，長得很快。我們是每年五月节杀一口猪春节杀一口猪，杀一口大的买进一口小的。杀了猪的板油、水油不往外卖，全留着燒菜吃。有了猪油，很少去买国家供应的豆油，为国家节省了食油。猪肉，每次最多留二十多斤，其余的都卖给食堂和邻居。一年两口猪，能卖出五百多斤肉，除了交納屠宰稅等以外，可以收入二百四五十元。

养鸡。1955年，我們在山头盖了一个小雞房，用节省下来的四个月的粮食錢，买了四十五只大洋雞，其中四十四只是母雞。喂雞的活由大孩子担当，早晚各喂一遍，每天起一次雞糞；中間由我再喂两遍。喂的飼料，是买来的米糠、麦麸子和孩子們揀来的雞蛋壳。这些雞，最多的时候，一天能下三十二个蛋，少的时候也能下二十七個。除了冬季和脫毛的一个时期，每只雞每年平均能下二百左右个蛋。1956年，全年下了八千八百来个蛋，卖得五百二十多元，除去飼

料一百八十元，淨剩三百四十多元。这年秋天，用卖鷄蛋的錢又买进三十只母鷄，死了几只，还有七十只呢。

打柴，揀煤核。每天五点多鐘，二孩子就起床了，她到机务段或者鍋爐房去揀一小时煤核。有时候，我做完了飯，丈夫上了班，也帶着未上学的孩子去揀煤核。秋后，大孩子和他父亲，利用星期和休班日子，上山去打柴、割野草。这样，再加上秋后收割的包米穉子，我們家两个爐眼，全年不仅不用买燒的，还存有三千多斤煤核，1950年买的二千斤木柃子，到現在只燒了五百来斤。

我們全家老少一齐动手搞副业生产，勤勤儉儉地过日子，家庭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丈夫从事体力劳动，年紀大了，每頓都給他做点細粮吃。平常日子，我和孩子都吃粗粮，过年过节才吃細粮。菜是自己种的，可以尽着吃；自己又养猪养鷄，猪肉鷄蛋也不少吃。我家虽然人口多，丈夫工資收入比較少，但解放几年来，除1956年我丈夫得了肋膜炎，休息四个半月，住了两个月医院，因住院交納飯費临时發生困难，工会救济了我們十五元外，平日的的生活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来解决的，不但沒有拉下債，还添了一些家具，买了一台縫紉机；1954到1956年三年买了一百四十三元公債，在銀行里存了六百二十二元，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并借給邻居一百多元，帮助他們解决了临时的困难。

由于搞副业生产改善了生活，保証了我丈夫安心地在医院里工作。他發揮積極性，工作有了成績，1955和1956年得到了四次物質奖励，1956年十一月和1957年一月，还連續

被評為醫院的先進生產者。特別是，通過副業生產，培養了孩子們愛勞動的觀點。每個孩子都知道要依靠自己的勞動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到時候自己就起床、揀糞、揀煤核、喂雞、下地、上山，都不用我過分地操心。兩個較小的孩子，在兩個大孩子的帶動下，也跟着上山背柴火，到鍋爐房揀煤核，下地去侍弄園子。

勤儉持家日子過得好

劉 路

我愛人在武漢電信局工作。1949年，我和我愛人帶著孩子來到武漢，家里連張吃飯的桌子也沒有，別人叫我愛人是“窮小生”。現在可不同了。我們把幾年來勤勞節儉積攢起來的錢，除了添置衣服和零星家具外，還陸續地買了兩只十七鑽的手表，一輛自行車，一部半新舊的收音機，一架縫紉機，鋼絲床和寫字台等。這些都是過去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都有了。合家身上穿的、家里用的，樣樣都不差，銀行里還有定期存款五百元，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來了，怎能有這樣幸福的生活呢？

解放後，我愛人每月工資六十元，工資改革後增加到七十元，一家五口人，天天吃大米、白面，生活過得不錯。但是我回想到過去連高粱米也吃不上的日子，覺得過好日子還

得精打細算，有計劃。我們是按每人每月八元來安排生活的，余下的就儲蓄起來。生活這樣安排了，到花的時候，我還是能省就省，能少花就少花。有時候碰到一些新上市的小菜，鄰居大嫂叫我買，我心想過幾天買，價錢便宜些不是一樣吃，也就沒買。有時候孩子們說：“這個菜今天好多呀！”我愛人接着就說：“保證這個菜便宜！”話里帶着諷刺。我聽了很生氣，好像節約是件“丑事”似的，自己愛人都這麼說，怪不得別人要說我“小氣死”了。以後，我上市場買菜，怕人笑話，總是躲着買，刮筲箕籃上的米粒，也是避着人。但是，有時候看到別的家屬吃得好、穿得好，也是過一輩子，想起解放了，自己生活並不困難，又不愁愛人失業，為啥不吃點穿點呢？真要買點好東西吃吃穿穿時，卻又覺得把錢胡亂花光了，要是有個病痛急事怎麼辦呢？這兩種思想，常常在我腦子里打架，分辨不清，不知到底該怎么做才好。後來，黨号召職工增產節約，工會也号召家屬貫徹以勤儉持家為中心的“五好”，我心里才亮堂了，才敢大大方方地搞節約了。

勤儉持家，包括勤和儉兩個方面。俗話說：“早起三朝當一工”；又說：“一天省一把，十年一匹馬”。我們勤儉持家，不僅是解決自己家庭紅白喜事、醫藥衛生等臨時開支，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還可以為國家節約物資，積累建設資金；它和勤儉建國血肉一樣聯系着。我逐步懂得了這個道理，對於用的東西，雖說是自己用錢買來的，但也是國家的財富，用的時候就更加注意節約。同時，自己能夠做的也都